《乌托邦》与《格列佛游记》的比较

张 世 红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北京 100091）

摘要：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但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理想社会。他们在作品中都用了虚构、夸张和讽刺等艺术手法。斯威夫特在创作《格列佛游记》的过程中，既借鉴了《乌托邦》，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

关键词：《乌托邦》；《格列佛游记》；比较；相似；借鉴；独创

中国分类号：I56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0)02-0044-06

《乌托邦》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这部发表于 1516 年的作品以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和莫尔的对话形式构成，描绘了理想的人类社会，并完整体现了莫尔的思想体系。正因为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其影响主要是在人类思想史方面，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即滥觞于它。有关它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大都从政治理论上探讨其价值，而往往忽略它对文学的影响。但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讽刺艺术对莫尔身后的文学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影响最为显著。《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发表于 1726 年。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英国文学的一朵奇葩。虽然《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但如果对这两部作品作一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正如歌德所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①

一

《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社会背景非常相似，都产生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莫尔生活在都铎王朝初期，英王对外频频发动战争，妄图称霸世界，对内进行残暴统治，血腥镇压康瓦尔农民起义，用刑严酷，杀人如麻。当时，由于羊毛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贵族豪绅将大片土地圈起来做牧场养羊。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到处流浪，或饿死沟壑，或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处死。举国一片哀号。莫尔非常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状况，他通过拉斐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尔之口，对当时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致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②]拉斐尔以平常的口气谈论羊吃人，没有惊讶，没有愤慨。可是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在讽刺英国的富人，他们比过去更残暴，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穷人。这不是羊吃人，而是人吃人。羊毛给富人带来了巨富，可广大农民却无以为生，沦为盗贼，尽管英王下令抓到盗窃犯一律绞死，可盗窃之风依然不绝。莫尔认为，以绞刑来制止盗窃是行不通的，对于除了盗窃外无路可走的人，无论用什么惩治办法，他还是要盗窃，而且，一个国家对盗窃犯和杀人犯用同样的刑罚会带来更可怕的恶果。当盗窃犯发现，盗窃受到的判刑与杀人受到的判刑一样时，这个简单的考虑就促使他把本来只想抢劫的对象索性杀掉，这样可以杀人灭口，掩盖罪行，对他来说反而安全了。政府虽然用酷刑威吓盗窃犯，实际上却怂恿他杀害无辜。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给以谋生之道，“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须亲自加以恢复，或将其转交给愿意加以恢复并乐于从事建设的人。振兴农业，恢复织布，让它成为光荣的职业，安插一大批有用的但闲着的人手。除非你们医治这些弊病，光是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这样的执法，表面好看，实则不公正，不收效。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③]莫尔不仅对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而且对英王草菅人命的暴政感到无比愤慨，一个人仅仅因为偷窃就得上绞架，这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幸运能给我们的全部财富全都比不上人的性命的宝贵”，[④]以人为本，视生命高于一切，这体现了莫尔的人道主义思想。

斯威夫特也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政治形势起伏不定的动荡时期。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它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外实行扩张政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涂炭生灵，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富人声色犬马，纵情享乐，穷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好靠乞讨、抢劫、偷窃等来谋生。“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民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⑤]斯威夫特通过小说主人公格列佛的叙述，揭露了英王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情况。

莫尔和斯威夫特不仅对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惨状况表示同情，而且痛恨朝廷的腐败，他们在书中对国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谄谀进行了抨击。不同的是，莫尔用拉斐尔作代言人来揭露富人的本质；而斯威夫特则通过描述小人国的朝廷来影射现实社会的统治阶级。莫尔认为，君主的荣誉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国王应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可是现实却相反，英王亨利七世贪得无厌，聚敛财富，为公主的婚礼和皇太子的晋爵士礼向国会勒索一笔费用，莫尔当时已是声望卓著的议员，只因莫尔发言反对，亨利七世便向莫尔进行报复，把莫尔的父亲囚禁在伦敦塔里，并罚以巨款。大臣们则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为剥削老百姓寻找种种理论根据。他们臆造出一种理论，说国王从来不做不公道的事，因为国家的一切，包括老百姓在内，都是属于国王的。莫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将现今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反复考虑之后，我断言，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⑥]在莫尔眼里，不仅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富人都是一丘之貉，利用国家机器压榨穷人。

《格列佛游记》第一部描写了格列佛在小人国的经历。这个小人国有一套和英国社会一样的官僚体制，弥漫着阴谋诡计和党派倾轧。这些身高不满六英寸的小人因鞋跟高低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而分党结派，勾心斗角，朝廷大臣为了讨好国王，不惜冒折断脖子的危险，在离地面十二英寸的一根绳子上表演跳高，谁跳得最高，谁就能获得晋升。在小说第三部里，斯威夫特揭露人们获取高官贵爵的方法是伪证、欺压、诈骗、迫使自己的妻女卖淫、出卖祖国和君王，他甚至将“枢密院”比作“马桶”，“参议院”比作“一群鹅”，“财政部”比作“无底洞”，整个朝廷比作“臭水坑”。格列佛在巴尔尼巴比王国了解到，参议院开会时，每位议员入席前都要按病情服药，有“轻泻剂、泻利剂、去痰剂、清耳剂”等等，从这些药名看，斯威夫特无疑是在讽刺当时英国议会政治的肮脏、污秽，需要彻底清洗。当大人国国王听完格列佛对英国近百年的大事记的叙述后，指出这些大事不过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恶果”[7]这是斯威夫特对英国百年史所作的痛快淋漓、切中要害的揭露和讽刺。

金钱是莫尔和斯威夫特涉及的另一大主题。金钱在人类历史上对商品交换、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金钱在促进商品交换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和不幸。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它的负面作用口诛笔伐。巴尔扎克曾说过，任何伟大的艺术家也写不尽黄金底下的罪恶。[8]莎士比亚把黄金斥为人尽可夫的娼妇，诅咒黄金“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高贵。”[9]在《乌托邦》里，我们看到国王为金钱对外发动战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大臣们为金钱尔诛我诈、颠倒黑白，贵族地主为金钱圈地牧羊，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出家园，金钱侵蚀了国家的肌体，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尔认为，如果人们全凭金钱衡量一切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因此，在莫尔设计的理想王国里，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不用付钱，金银只按其本身性质使用，使用价值还不如铁。人们用金银制作手铐或脚链，甚至用金银来制作粪桶和尿盆，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以及一顶金冠，金器成了可鄙的标记，“在乌托邦，金钱既不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金钱。这就砍掉多少烦恼啊！这就铲除了多少罪恶啊！谁不知道，金钱既然取消，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虽然每天受到惩罚却只能施以打击而不能制止的罪行，就不发生了？谁又不知恐惧、焦虑、烦恼、辛苦的操作、不眠的通宵，也会随金钱的消失而消失？而且，贫穷似乎是仅仅缺乏金钱所造成，一旦金钱到处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10]

同样，斯威夫特也意识到金钱的罪恶，它不仅使人性扭曲，而且使社会失去公正。斯威夫特模仿《乌托邦》，在《格列佛游记》里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金钱的理想社会——智马国，该国国民（即智马，也叫慧马因）不用金钱，因为一切产品平均分配，它们的头脑里没有金钱的概念。当格列佛谈到英国律师为了金钱而作伪证坑害人时，智马不明白人类要金钱干什么，格列佛向它解释，如果有了金钱，就可以买最漂亮的衣服，拥有华丽的房屋，大片的土地，享受美酒佳肴，还可以挑选最美丽的女性。因此人类天性就希望钱越多越好，越多越贪，永无止境。而智马国有一种叫“耶胡”的畜生，其状如人，天性贪婪、残暴，非常喜欢一种闪亮的石头（即宝石），常常用爪子一连挖上好几天，把挖出来的宝石埋藏在窝里，有时耶胡之间为了争夺这种石头而互相残杀，发生激烈的战争。斯威夫特显然是用耶胡来讽刺人类对金钱的贪婪。

莫尔和斯威夫特不仅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而且对人类自身的弱点——骄傲自大也给予了鞭苔。骄狂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恶习，它妨碍人类学习先进经验，阻止社会向前发展，因此，莫尔称骄狂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母。”[11]在斯威夫特眼里，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类的种种罪恶就已经罄竹难书，但是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人类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如果‘耶胡’种仅仅有着生来就有的罪恶，我跟他们和睦相处也并不见得困难。我看见律师、扒手、上校、傻子、贵族、赌棍、政客、老鸨、医生、证人、教唆者、讼师、卖国贼等也并不生气。这都是合乎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丑陋不堪的家伙，身上有病心里也有病，却又骄傲不过，我马上就会失去耐心勃然大怒。我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这种动物和这种罪恶（骄傲）会搅在一起……我对这个问题谈得较多，为的是希望自己跟英国‘耶胡’相处时不至于感到不能忍受。所以我现在请求沾染着这种罪恶的人不要随便走到我的面前来。”⑫斯威夫特借格列佛之口表达了对人类骄狂的深恶痛绝

在对现实社会阴暗面和人性弱点的揭露上，《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有着惊人的一致，莫尔和斯威夫特都对统治阶级的残暴虚伪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撕下达官贵人的各种伪装，把掩盖在“太平盛世”外衣下的社会疽痈、毒瘤、罪恶、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就广度而言，《格列佛游记》比《乌托邦》揭露的社会问题更多，批判的范围更广。

二

莫尔和斯夫特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批判现实社会。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基础上，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而手法都是虚构理想国度。莫尔在《乌托邦》的第二部里描绘了理想的人类社会，同第一部所描写的英国及欧洲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乌托邦王国里，没有党派斗争，没有尔谀我诈，没有贪婪、欺骗、和掠夺。社会财富为全民所有，没有贵族和地主，也没有穷人和乞丐，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除了少数经民主选举的官员从事管理工作外，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以增加国家财富和改进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状况，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仍然从事劳动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人们不为吃饭问题操心，不为住房问题所困，无忧无虑，生活幸福，每人一无所有，但每人又都富裕。乌托邦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不但要求儿童和青年读书求知，还重视培养他们的品德，全社会都提倡公共道德、集体义务、正当娱乐，以形成良好的风气，人们不仅在物质上是幸福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幸福的。乌托邦人认为，每个人只有当他给别人带来幸福或减轻别人的痛苦时，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只为自己不为他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因此，在乌托邦王国里，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拉斐尔在乌托邦王国生活了5年，如果不是因为要让外人知道这个新世界，他决不愿离开，他说“世上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民族和更幸福的国家。”⑬

同样，斯威夫特写《格列佛游记》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善良……改善人们的思想。”⑭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揭露和讽刺现实社会是不够的。为此，斯威夫特虚构了美好的理想社会，以表现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主张，提供治疗社会弊病的药方。《格列佛游记》的第二部大人国和第四部智马国象征斯威夫特的理想社会。大人国国王是一位智慧无穷、才华卓越、受人民爱戴的开明君主，他凭理智、仁慈和公理来治理国家，他憎恶一切矫揉造作和阴谋诡计，一心为民谋利。他认为，“谁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⑮与现实中昏庸无能、追求虚荣、欺压百姓的国王相比，大人国国王无疑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第四部描写格列佛在智马国的经历。智马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在这里，社会产品全民共享，如果某个地区缺少什么物资，其他地区踊跃捐助。智马之间人人平等，充满了友谊仁爱，它们崇尚理性，热爱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真理，勤劳勇敢，忠诚爱国，与人类的腐化堕落相比，智马有许多美德，这使格列佛扩大了眼界，受到了感化。这里没有党争、污陷、欺骗，格列佛与智马相处一段时间后，身体健康，心理平静，他既用不着害怕朋友的背叛，也用不着防备敌人的攻击，既不必使用贿赂和谄媚等手段去讨好大人物，也不必担心受骗上当。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社会使格列佛乐不思蜀，再也不想回到英国了。“我到了这个国家还不到一年，就十分敬爱当地的居民，决心不再回到人类中来，决心跟这些可敬的慧马在一起过一辈子，对它们的各种美德加以研究并付诸实践，在那儿我既没有坏榜样，也不会受到罪恶的引诱。”[16]后来，由于智马认为格列佛是耶胡的同类，不允许留下，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智马国。

《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鲜明对照使我们看到，作者对现实社会所作的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判，是为了突出正面的理想社会，使之显得尽善尽美。莫尔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而斯威夫特代表的是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两位作者都对现实社会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开出各自的良方，试图治愈这些社会弊病。

三

如上所述，莫尔和斯威夫特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把夸张和讽刺作为揭露社会黑暗的重要艺术武器，使人在发笑之余，掩卷深思，进一步认识到讽刺对象的丑恶本质。

夸张手法是《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一大特点。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本是温顺、驯服、胆小，圣经里把最听话、最安分守己的人称作“上帝的羔羊”。然而，在《乌托邦》第一部里，莫尔告诉人们，羊变了，它不再温顺，它变得凶蛮、贪婪，以至于吃人了。莫尔用“羊吃人”的夸张手法抨击当时的圈地运动，使人联想到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家园，饿死沟壑或沦为盗贼被绞死的悲惨景象。而造成这一切的罪恶根源是金钱，是富人对金钱的贪婪，莫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在《乌托邦》第二部里，莫尔没有说黄金毫无用处，而是强调乌托邦国民用黄金来制作手铐和便桶，这种夸张的手法更反衬出现实社会中金钱的肮脏和罪恶。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使用夸张手法的地方俯拾即是。例如，他把小人国党派斗争的起因夸张为鞋跟高低十四分之一英寸的差别，把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起因夸张为吃鸡蛋先打破大端还是先打破小端的争执，把晋升官职的标准夸张为冒生命危险在绳子上比赛，看谁跳得高，等等。这些可笑可鄙的夸张情节使人联想到现实朝廷政治的腐败不堪和荒唐透顶。由于莫尔和斯威夫特的夸张描写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分别是16世纪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反映，虽然这些情节经过夸张艺术的处理，但不仅没有失去生活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反而使这些夸张描写更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颠覆性。

反讽是莫尔和斯威夫特擅长的另一个艺术手法。例如在《乌托邦》第一部里，拉斐尔谈到大臣们向国王献计，告诉国王如何欺榨老百姓以聚敛财富，并有法律可解释其所做所为的合法性。他们向国王阐述，老百姓越穷对国王越有利，因为贫穷可以带来社会稳定。现实恰好相反，贫穷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只有当老百姓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时，天下才会太平。显然，莫尔并不是在倡导统治者压榨老百姓，而是在用反语来讽刺国王的贪婪和大臣们的卑鄙。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也用了反讽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手法。例如，当大人国国王要求格列佛介绍英国的情况时，格列佛恨不能有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口才，用最美丽的语言颂扬自己的伟大祖国。他把英国的山河地貌、典章制度、丰功伟绩一一向主人作了介绍：他称赞国王的贤明，说在他的治下国泰民安；褒扬议员的盛德，说他们德才兼备，是国家的栋梁；夸奖法官的方正，说他们为民除害；推许教士的圣洁，说他们是人民的精神领袖。然而，上述一切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现实中的英王昏庸无能，在他的治下民不聊生；议员们接受贿赂，个个是国家的蛀虫；法官贪赃枉法，趋炎附势；教士虚妄猥琐，随波逐流。在小说结尾处格列佛谈到英国的殖民政策时说："英国人在开辟殖民地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智慧、小心和正义；在促进宗教、学术的发展方面所表现的充分才能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他们选派虔诚、干练的教士传布基督教义；他们审慎地把本国生活正派、廉洁的官员派去担任各殖民地的行政官吏；苦心孤诣在各地施行仁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委派的总督都是精力充沛、极为有德的人物，一心一意只考虑到治下人民的幸福和他们国王的荣誉。"⑰格列佛的叙述一本正经，俨然以一副歌功颂德者的面孔出现，赞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给世界各地带来福祉。然而，这段溢美之言字字句句都是反语，让人联想到的是英国侵略者在殖民地烧杀掳掠的血腥画面。"正义、仁政、幸福"等词在此实际上意味着野蛮、残暴、灾难。斯威夫特没有正面抨击英国的殖民政策，而是采用反讽手法，但其震撼人心的讽刺力量远远超过直截了当的抨击。

通过对《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这两部作品都有相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理想社会；他们都用了虚构、夸张和讽刺等艺术手法。但也有不同之处：莫尔在《乌托邦》里虚构了一个理想世界，而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虚构了四个海外异邦：小人国，大人国，飞岛，智马国，这些离奇怪异、丰富多采的幻想世界引人入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莫尔侧重于向人们描绘一个崭新的美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阐述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斯威夫特更侧重于否定现实，对腐败的政治、肮脏的党争、虚伪的宗教、骗人的司法、野蛮的殖民战争，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斯威夫特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他那严肃的批判精神和入木三分的讽刺力量，"使他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⑱

---

①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第 105 页。

②③④⑥⑩⑪⑬ 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7 月版，第 21 页，第 23—24 页，第 25 页，第 117 页，第 117 页，第 118 页，第 81 页。

⑤⑦⑫⑭⑮⑯⑰ 江奈生·斯威夫特著，张健译：《格列佛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第 267 页，第 115 页，第 282 页，第 278 页，第 119 页，第 243 页，第 280 页。

⑧ 转引自白凤忠：《两个相似的悲剧》，《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科版)》，1986 年第 1 期，第 61 页。

⑨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雅典的泰门》，《莎士比亚全集》第 5 卷，新世纪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1 版，第 49 页。

⑱ 阿尼克斯特著，戴镏龄、吴志谦等译：《英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第 211 页。

（责任编辑　匡　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